

浙江农户农业风险管理措施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西爱琴, 吕 品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基于浙江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资料, 首先分析目前浙江农户所采用的具体农业风险管理措施, 然后借鉴国外先进的方法并结合实际构建浙江农户农业风险管理的实证模型, 对目前浙江微观农业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分析, 揭示微观农业风险管理机制的运行、保障机理及其适用性。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建立适合浙江及我国农户特点的风险管理策略及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议与启示。

【关键词】农户; 风险管理; 农业风险; 浙江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在农产品市场国际化、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 我国的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是否能够有效防范、弱化农业风险, 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目前我国, 由政府、保险公司、中介组织、农业企业及农户等主体共同参与, 涉及产前、产中与产后各环节, 包括灾前防范与灾后救济等内容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运行机制也逐步完善, 可采用的农业风险管理措施日益增多。但由于生产经营的产品的特性、生产方式不同, 即使是相同风险管理体系下的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也会有所不同, 故而农户所采取的具体风险管理措施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例如, 目前我国开展的农业保险主要是防范自然灾害带来的产量变动风险, 基本不能防范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而另一方面, “订单农业”能较为有效地应对市场价格风险, 但是却很少能顾及到产量风险。针对这些问题, 考察农户所采用的具体风险管理工具(措施)的适用性, 探究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理, 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有关风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国外学者很早就予以关注, 尤其是随着预期效用理论的发展, 产生了一些预期效用模型, 并被大量用于研究风险条件下微观农业风险反应问题,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已经逐渐完善和成熟。其中大量采用规划模型, 如二次规划的均值-方差(E-V)模型及其线性替代模型, 总绝对偏差最小化(MOTAD)模型等。由于MOTAD模型在解决预期效用问题方面与二次规划同样有效, 不仅能充分描述微观农业生产的风险反应, 其建模方法和运算也相对简便, 并保留了二次规划模型的很多优点, 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

就农业风险类型和来源而言, 国际知名学者Partrick等的研究表明, 产量和价格变动是各国农业生产经营中普遍存在和最主要的^[1]。经营者个体特征(性别、年龄、风险偏好等)、农场特征(规模、种植还是养殖、产品种类及品种等)以及生产方式不同的农场(户), 其农业风险及具体管理措施有所差异。农场(户)通过成功地运用适当的风险管理策略可以提高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如多元化经营、签订生产合约、购买农业保险等。除了这些具体措施, 综合的办法是通过垂直一体化来弱化农业风险。此外, 合作社在规避市场风险, 保护农民利益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2]。但是由于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各自有其适宜的范围和目标, 并且

收稿日期: 2009-12-07

基金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Y6080399); 浙江理工大学留学人员引进项目(0605287-Y)

作者简介: 西爱琴(1975-), 女, 山东淄博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

农民的个体特征和农场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农民所采用的具体风险管理工具和策略不同。此外,相关成本、风险水平、不同类型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及获取赔偿的渠道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民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3]。

我国学者对于农业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农业风险类型、国外农业风险管理介绍与我国农业风险管理模式及体制构建等宏观层面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孙良媛等认为风险类型和来源的不同决定了风险管理方式的不同,需要多种形式的风险管理手段,并在2002年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农户而言农业组织在改善农业生产者抵御风险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4]。张叶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不能有效化解自然灾害风险,其作用只在于化解市场价格风险,并且不同产业化模式(市场+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化解市场风险的条件与效果不同^[5]。虞锡君认为农业保险与农业产业化是互相促进的,应当基于两者的互动机制构建农业保险体制。栾敬东等提出了农业风险类型之间的关联性与风险管理方式之间的孤立性是导致我国存在着农业高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低效率的根本原因。但上述分析多限于理论探讨,尚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6]。此外一些学者从微观视角来进行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陈风波等研究了中国南方农户对于旱风险管理策略的有效性,如多样化(地块多样化、作物多样化和收入来源多样化)、弹性化(适时调整插秧时间、作物种植和生产投入等)及消费平滑策略等。结果表明这些策略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农户农业风险的弱化和防范,仅靠其自身力量是有限的,还需要政府和科研部门的共同参与^[7]。

我国对于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较偏重于宏观层面,尽管近年来逐渐转向微观层面,但多以定性研究或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对于农业产业化、农业保险等具体的风险管理措施在稳定农民收入、化解农户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作用的量化研究非常缺乏。而浙江的订单农业及农业保险的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基于浙江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资料,首先对目前农户在实际生产中所采用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说明,然后运用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模型方法结合浙江实际构建浙江农业风险管理模型(ZJ-ARMM)模拟参加农业保险和订单农业这两项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及其适用范围,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完善浙江及我国农户农业风险管理的措施。

1 调查地区农业风险及管理状况

笔者于2005年4~6月对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王家村和大柳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嘉善经济发达,是国家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市)和“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之一。嘉善的农业也很发达,是全国商品粮、商品猪和淡水鱼生产基地之一,瓜果、蘑菇、畜禽、花卉、淡水产品等五大特色主导产业初具规模。

王家村和大柳村的被调查农户数分别为60户和40户,大约为本村农户总数的20%。虽然两个调查村的农业自然、地理、社会和经济条件差异不大,但是受生产传统与习惯的影响,王家村和大柳村却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作物种植制度。其中王家村农户主要以蔬菜尤其是大棚蔬菜的生产为主,而大柳村农户则以长毛兔和桑蚕等的养殖为主要生产项目。

浙江嘉善王家村和大柳村由于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相近,因此所面临的风险状况相近。其中,种植业生产风险主要有: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动导致的市场风险,种苗质量问题、台风暴雨及干旱等自然灾害及植物病虫害等造成的产量损失,以及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导致农户投入支出增加。本地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畅通,主要是由于当地的蔬菜特别是王家村的大棚蔬菜生产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并有一定知名度,因此当蔬菜收获季节到来时,会有大量外地经销商驱车到村里来收购,不用农户自己找销路。但是由于是单个散户,农户之间没有形成联合,因此在与经销商进行交易时,处于不利地位,缺乏讨价还价的力量。

对于上述风险因素,农户采取了一定的防范和应对措施。例如,为了避免农产品市场价格不稳定带来的市场风险,有些农户适当调整产品种植周期,错开农产品上市时间,避免产品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波动。对于由种苗质量引起的减产问题,农户一般是到种籽公司索赔,但是索赔金额也只能达到当时购买种籽的金额。而对于台风暴雨这样的“天灾”带来的损失,农户缺乏有效的防范和应对措施。两个村都由村集体统一修建了水渠等灌溉设施,以保证村民农业生产用水,因此可以比较有效地抵御干旱。而对于植物病虫害,除喷洒农药进行防治之外,很多农户还采用减少化肥施用量而增施农家肥的办法,此外也通过采取适当的轮作方式来改善土壤质地。调查中,农民反映最多的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太快,但是又没有任何办法,除非少用或不用。值得注意的

是,王家村有不少农户加入了“惠民镇大棚蔬菜专业合作社”,但是在农业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方面,合作社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实地调查中农户提到的农业风险弱化措施,主要有:a)采用新品种;b)多元化种植;c)提高自身文化程度;d)收集市场信息;e)采用订单农业方式;f)加入合作组织;g)政府的支持,包括修建水利设施、最低保护价等。另外在调查时笔者还就期货市场进行了咨询,结果 90%以上的农民都没有听说过,仅有极少数从电视上得知,但是根本不了解。总体上,按照所选择的农户数量大小,样本农户认为有效的风险弱化措施依次是:a)采用新品种;b)采用订单农业方式;c)提高自身的文化程度;d)多元化生产;e)掌握更多的市场信息。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农业保险,很多农户表示只要有合适的品种就会参加;而绝大多数参加订单农业的农户都认为这是一种较好的模式。因此下面就参加农业保险和订单农业两种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

2 农业风险管理有效性的模拟分析

2.1 研究方法

根据预期效用理论,农户农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表现为既定预期收入水平下的风险最小,或者既定风险水平下的预期收入最大。基于此,笔者借鉴国外农业经济界广泛采用的总绝对偏差最小化(MOTAD)模型,并结合浙江农业实际,构建浙江农户农业风险管理的实证(ZJ-ARMM)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min \frac{TAD}{2} = \sum_{h=1}^s y_h^-$$

$$\text{s.t.} \quad \sum_{j=1}^n (c_{hj} - \bar{c}_j) x_j + y_h^- \geq 0 \quad (h = 1, 2, \dots, s; j = 1, 2, \dots, n) \quad (1)$$

$$\sum_{j=1}^n \bar{c}_j x_j = \lambda \quad (2)$$

$$\sum_{j=1}^n a_{ij} x_j \leq b_i \quad (i = 1, 2, \dots, m) \quad (3)$$

$$x_j, y_h^- \geq 0 \quad (j = 1, 2, \dots, n) \quad (4)$$

式(1)中,TAD 是收入的总绝对偏差, y_h^- 表示某种自然状态下各生产项目中,实际收益水平小于样本平均水平的绝对偏差的绝对值之和, c_{hj} 是第 j 项活动在自然状态 h 下的单位实际收益, $\bar{c}_j$ 代表第 j 项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期望毛利润, x_j 是第 j 项活动的规模, s 是自然状态的数量, h 的取值范围为 $1 \sim s$ 。 $\sum_{j=1}^n \bar{c}_j x_j$ 代表总期望毛利润 E ,由方程(2)中的参数 λ 约束,其中 λ 是一个变动的标量。 a_{ij} 为技术系数,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资源数量。 b_i 为资源的限量,也即农户所拥有的 m 种农业生产资源中第 i 种资源数量。通过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得到参数 λ 的不同取值,从而可以确定一系列相对应的最大化的 E 值。

上述模型中, y_h^- 是风险水平的度量, E 代表收益水平。由于可以同时求得多个不同水平的风险与收益的组合,因此生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不同的风险收益水平所代表的生产项目。若出现高风险、高收益的组合,则表明农户是风险偏好的,反之,若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组合,则表明农户有风险规避倾向。因此,该模型的计算结果能体现农业风险水平、收益水平及风险偏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不仅可以对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从中也可以看出农户的风险偏好取向。

需要说明的是,单位收益是指每单位(每亩/头/只/张等)的产量乘以市场价格,再扣除销售成本与直接成本之后的收益。实证模型中相关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在下文“情景设计”中有详细说明。

2.2 ZJ-ARMM 的构建

2.2.1 “典型农户”构建

要构建 ZJ-ARMM, 首先要考虑代表性的问题。在实地调查中发现, 虽然在同一地区的农户面临相同的自然、市场等风险因素, 所处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也相同, 但是个体农民之间的经营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个体特征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风险偏好, 从而影响其生产决策及风险管理措施的采用, 所以实地调查所涉及的单个农户的风险管理行为不能代表整个地区的基本情况。因此, 笔者实证分析所针对的农户不是某一具体的实际调查农户, 而是构建的能代表本地区整体情况的典型意义上的农户, 所谓“典型农户”。

考虑到“典型农户”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 笔者取各项指标的样本均值来表示该地区农户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 包括拥有的劳动力、土地及资金等生产要素总水平、各农业生产项目所需的物质投入、劳动力投入等生产成本及单位产品产量、销售价格等指标。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两个村典型农户的家庭总人口、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数量、总耕地面积、总耕地块数及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差别不大, 但是在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以及农业资金投入方面却有较大差距, 以大棚蔬菜经营为主的王家村农户, 在上述指标上都高于大柳村农户; 并且两个村农户的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 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 因为有些农户拥有面积、数量不等的林地。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及成产决策者的户主文化程度均偏低, 只上过 6 年多的学, 没有受过完整的初中教育。

表 1 “典型农户”基本特征的统计描述

指标	王家村	大柳村
家庭总人口数/人	3.98	4.55
总劳动力数量/人	2.68	2.88
农业劳动力 [*] /人	1.97	1.67
常年从事非农劳动力数量/人	0.71	1.05
总耕(园、林)地面积/亩	9.84	8.86
耕(园、林)地块数/块	4.90	4.71
家庭总收入/元	30 033	23 423
农业收入/元	20 164	11 363
(农业收入/总收入)/%	67.10	48.50
农业资金投入水平/元	13 866	10 772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6.24	6.35

注: *农业劳动力包括常年务农劳动力和半务农劳力。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实地调查资料计算。

2.2.2 “情景”设计

由于王家村和大柳村农户的晚稻生产属于“合约生产”, 且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深, 也会促使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和利益机制创新, 故而通过合同方式进行生产的农户数量会逐渐增加。同时目前我国农业

保险处于改革试点阶段,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农业保险会成为农户重要的风险管理手段之一。因此,笔者设计“合约生产”和“产量保险”两个风险管理情景,模拟典型农户在相应情景下风险决策的优化反应,以实证分析农业风险管理对策的有效性。

a)“合约情景”:在此情景下,农户各项生产项目的收益,会有一个最低价格作为支持。根据对农户的实地访谈,大部分农户认为,通过签订合约,能够获得的最低收益不低于当地平均收益的75%。

b)“保险情景”:参照美国等国外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该情景中,笔者假定农户所有种植业生产项目都参加了农作物产量保险,当产量低于当地平均单产水平的60%时,会按照平均单产水平的60%获得赔偿;对于养殖业项目,简化之,假定畜产品单位产量低于平均水平60%以下的,都按照达到单位产量的60%计算。在确定“典型农户”所需要支付的保险费水平时,参照国外农业保险的保费水平并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户的承受能力,采用统一费率,为该项目单位期望收益的1%和5%两个水平。

单位期望收益的计算方法如下:第一,分别计算每个村各样本农户某种农业生产项目的单位纯收益,并将该项目按照单位纯收益进行排序;第二,依次按照单位纯收益的大小将生产该生产项目的样本分为5个区间,分别代表“很差”、“较差”、“中等”、“较好”以及“很好”等5种情况,也就是5种自然状态;第三,统计单位收益落在每个区间内的频数,则该频数除以该产品样本总数就代表每个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第四,对该产品每个区间的单位收益按生产规模进行加权平均,就得到各区间单位收益的加权平均值,也即各自然状态下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收益;第五,将各种自然状态的平均单位收益值乘以其相应的概率,加总求和之后就可以得到该农业生产项目单位收益的数学期望值,即单位期望收益。

然后,将各自然状态下的平均单位收益与上述求得的单位期望收益相减,就得到每个自然状态下的单位收益偏差系数,由于有5个自然状态,因此每种产品都对应5个偏差系数;再将某产品项目各自然状态下的单位收益偏差系数与其规模相乘,并取绝对值进行加总,就得到总绝对偏差,也就是该项目风险水平的度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偏差系数是各自然状态下的样本均值偏离总体样本均值的程度,因此在不取绝对值的情况下,同一产品各自然状态下单位偏差系数之和应该等于零。

2.3 结果分析

2.3.1 “合约情景”

a)风险与收益的互动关系。整体而言,与非风险管理情景相比,在“合约情景”下,典型农户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相应的风险水平也呈现出不同的下降趋势。其中,“非风险管理情景”是指不采用风险管理措施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要素投入及风险、收益水平。

浙江王家村农户最大可能的收益水平,从26 683元提高到了28 650元,增加了近2 000元,而风险水平则稍有下降,从2 507元下降为2 458元(见图1、图2)。而从其余各风险收益组合中也可以看出,与非风险管理情景下相比,王家村农户在进行合约生产的情况下,取得相同的总收益水平,所面临的风险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表明,以蔬菜尤其是大棚蔬菜生产为主的王家村农户,如果采用合约生产,稳定农产品价格,则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且风险水平有所减小。

图3、图4显示,大泖村农户在“合约生产”情景下,最大可能的总收益水平可以达到25 607元,比不采用合约生产情况下的总收益(23 047元)提高了约2 600元,提高幅度大于王家村。而相应的风险水平,从非风险管理情景下的3 013元下降到了2 996元。同时对比非风险管理与“合约生产”情景下的各风险收益组合,可以发现,就相近的风险水平而言,在“合约情景”下的总期望收益水平要高于非风险管理情景,而就相近的总期望收益水平而言,所对应的农业风险水平在“合约情景”下均低于非风险管理情景。因此,在“合约情景”下,大泖村农户可以在较低的风险水平下取得较高的农业生产总收益,合约生产有利于大泖村农户弱化农业风险并提高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

b) 要素投入与风险收益水平的互动关系。就要素的投入水平而言,整体上两个村的农户在“合约情景”下,投入与非风险管理情景下相同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获得更大的农业预期总收入水平,表明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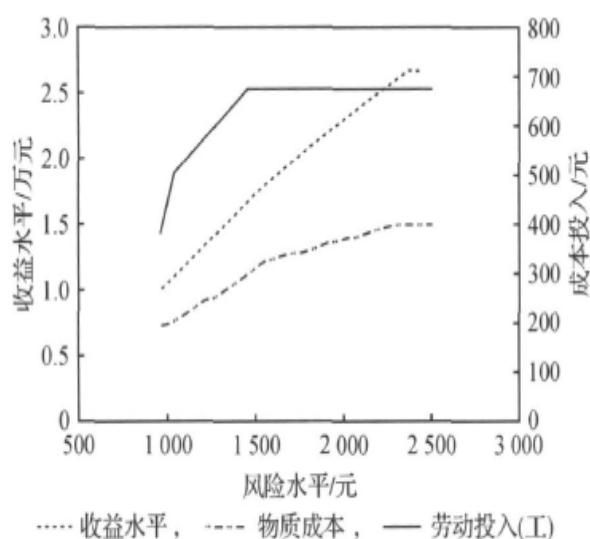


图1 非风险管理情景下王家村农户的风险、成本与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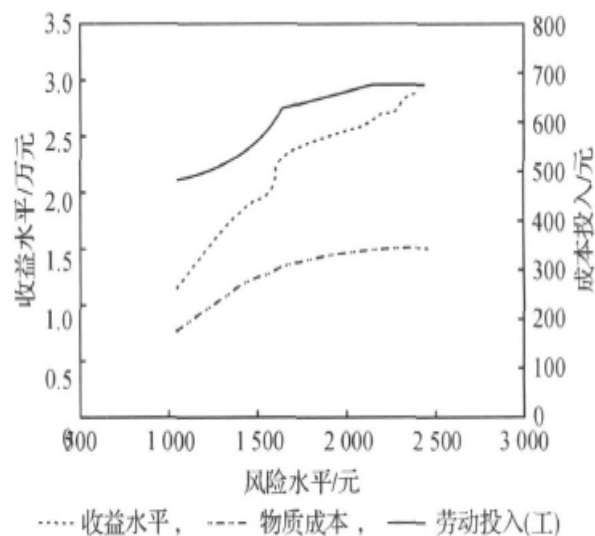


图2 合约情景下王家村农户的风险、成本与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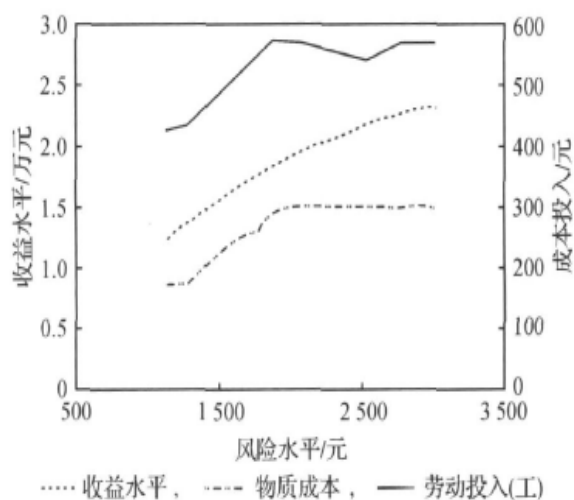


图3 非风险管理情景下大柳村农户的风险、成本与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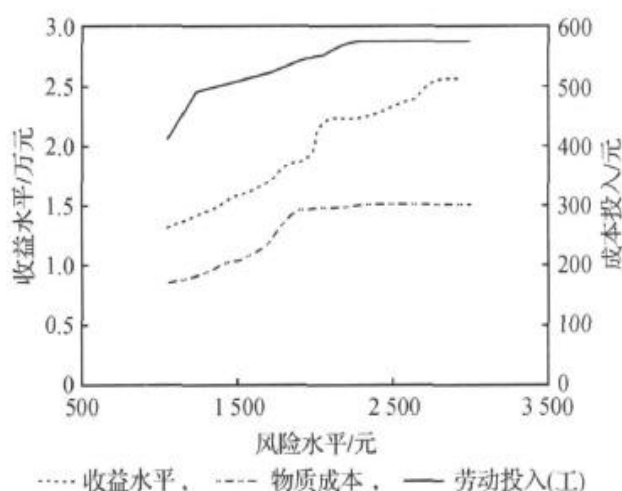


图4 合约情景下大柳村农户的风险、成本与收益

在“合约情景”下,王家村农户劳动力和资金在多数情况下都构成约束,表明以蔬菜尤其是大棚蔬菜生产为主的农业经营,不仅耗费较多的劳动,也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同时,如图2所显示,在总收益水平达到26 000元以后,风险收益水平的增加,却不需要相应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增加,这表明在“合约情景”下,王家村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总收益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户的风险偏好。如果农户对农业风险持有偏好的态度,则在不增加劳动和资金投入水平的情况下,仅选择风险性较大的生产项目组合,就可以显著增加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

从图3和图4显示的要素投入水平与风险收益的关系来看,与非风险管理情景相比,在“合约情景”下,大柳村农户的劳动力在总收益水平达到22 100元的时候构成约束,表明以养殖业为主要经营项目的大柳村农户,如果要在农业生产上获取更高的收益水平,就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对于资金投入而言,在收益水平为22 100~23 500元之间,投入的资金水平接近但并没有达到所

允许投入的资金最大值。这表明,在大柳村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中,劳动的边际收益要大于资本的边际收益。

2.3.2 “保险情景”

a)不同保费水平。就不同保险费率对农户收益的影响大小来看,王家村典型农户在 1%和 5%的保险费率情景下,最大可能的农业总收益水平分别为 27 831 元和 27 508 元,相差 300 元左右(见图 5、图 6);大柳村“典型农户”在 1%的保险费率下,最大可能的收益水平为 25 151 元,而 5%的保险费率下为 24 888 元,相差大约也是 300 元左右,如图 7 和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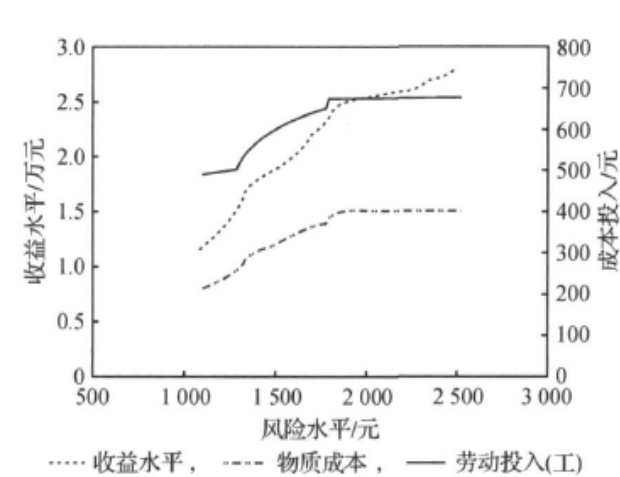


图 5 1%保费情景下王家村农户的风险、成本与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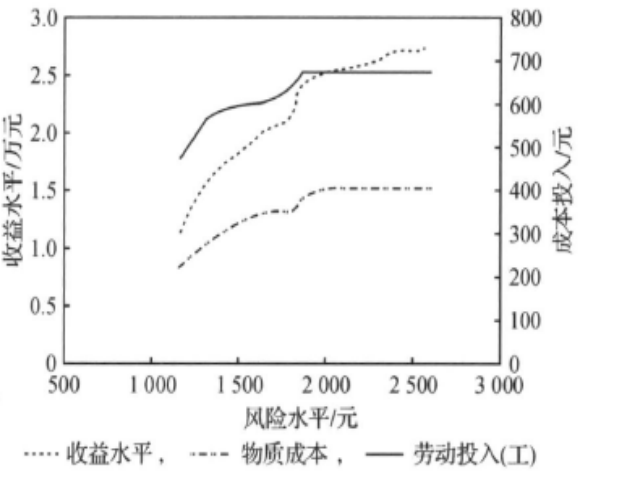


图 6 5%保费情景下王家村农户的风险、成本与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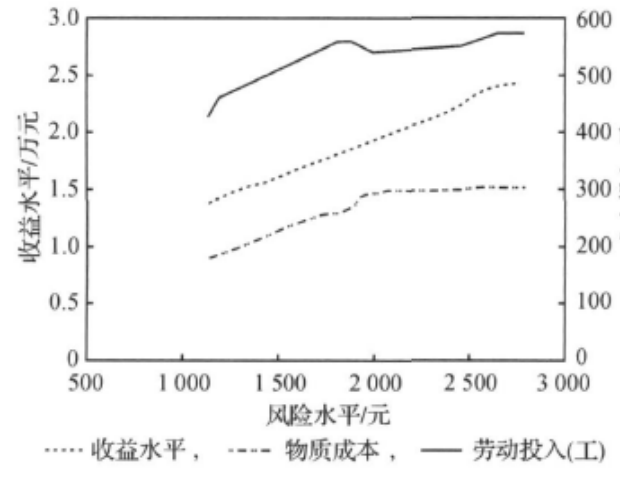


图 7 1%保费情景下大柳村农户的风险、成本与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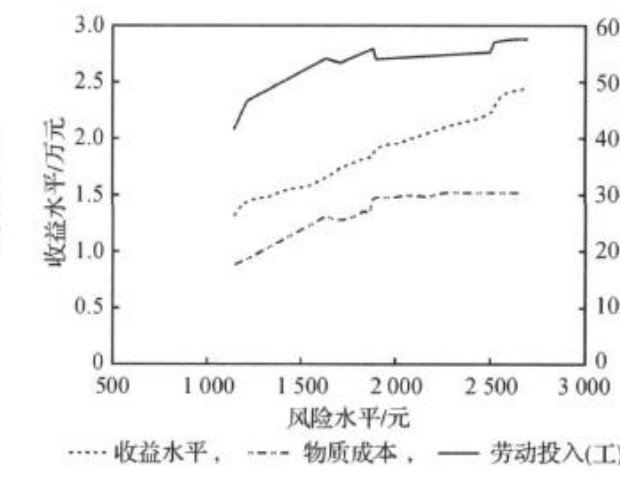


图 8 5%保费情景下大柳村农户的风险、成本与收益

b)非风险管理情景与“保险情景”。与非风险情景相比,在“保险情景”下农户的农业风险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收益水平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且在保险费率为 1%的水平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大可能的收入水平要高于 5%的保险费率所对应的最大化收益。

在 1%和 5%的保险费率情景下,王家村农户最大可能的农业总收益水平分别为 27 831 元和 27 508 元,高于非风险管理情景下

最大可能的收益水平,增加幅度分别为 1 100 元和 900 元左右。从图 5 和图 6 显示的各风险收益组合的互动关系来看,在“保险情景”下,王家村农户如果面临与非风险管理情景下相同的风险水平,则可以获得更高的农业总收益水平。表明农业产量保险在提高王家村农户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并弱化其经营风险方面,效果较为显著。

大柳村“典型农户”在 1%和 5%的保险费率下,最大可能的收益水平分别达到了 25 151 元和 24 888 元,比非风险管理情景下 23 047 元分别增加了 2 104 元和 1 841 元(如图 7、图 8 所示),表明大柳村农户的农业生产中,如果能够对各生产项目进行产量保险,则农户的总收益水平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水平下,在“保险情景”下,大柳村农户可以获得比非风险管理情景下更高的农业总收益水平。

2.3.3 “保险情景”与“合约情景”

就最大化预期收益的增加幅度而言,王家村农户在“合约情景”下的农业总收益水平,可以比非风险管理情景提高 2 000 元左右,而“保险情景”中,在 1%和 5%的保费水平下收益的增加幅度分别为 1 100 元和 900 元左右,小于“合约情景”。表明以大棚蔬菜生产为主的王家村农户,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总收益的影响要大于产量变动,或者说,王家村农户所从事的农业生产项目,产量水平的波动要小于价格波动,因此“合约情景”比“保险情景”更加有效。

大柳村“典型农户”在“合约情景”下最大可能的农业生产总收益水平,比非风险管理情景下提高 2 600 元左右,而在“保险情景”下,按照 1%和 5%的保险费率,收益的增加幅度分别为 2 100 元和 1 800 元左右,略低于“合约情景”。表明大柳村农户的农业生产项目中,各产品的价格和产量波动幅度都对农户的总收益水平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价格波动的作用较大。

3 结论与启示

第一,有效实施农产品产量保险或事先签订生产合约,均有助于农户弱化农业风险水平,并能够稳定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总收益水平。但是这两种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适用性不完全相同,也即对于不同特征的农户所起的作用大小有所不同。对于从事蔬菜种植和肉猪等养殖业的农户而言,合约生产的作用要稍大于产量保险。

第二,不同的保险费率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水平。相对于较低的保险费率而言,在较高的保险费率水平上,农户的最大化收益水平要有所降低,但是就降低的幅度而言,不同的农户略有不同。由于笔者所调查的两个村在地理位置等方面较相近,因此哪种类型的农户对保险费率的反应更敏感,还有待进一步实证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保险费率,不但提高农户参与率和保障水平,还会稳定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

第三,农户所经营的项目特性决定了其面临的农业风险水平,由此也决定了所采用的风险管理策略。一般来说,相对于产量而言,养殖业和蔬菜生产的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因此农户比较有效的管理对策是通过签订生产合约,稳定销售价格;而粮食等大田作物而言,产量保险是比较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第四,在农户采取上述有关农业风险管理对策的同时,鉴于单个农户在弱化农业风险能力的有限性,政府也应该在降低农业风险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完善农业风险政策与管理体系,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a)在发展农业保险方面,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适当增加保险品种并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保险费率;b)健全灾害救助制度,改革农业支持政策;c)健全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 Cory N, Patrick G F, Baker T. The effects of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with diversified hog/crop production[C].

Select-ed Paper for 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s at Nashville, Tennessee, 1999.

[2] Giancarlo M, David A H. Uncertainty, Risk Aversion and Risk Managemen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ers[M]//Gardner B,Rausser G.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2000.

[3] Hardaker J B, Hiurne R B M, Anderson J R, et al. Coping with Risk in Agriculture[M]. Oxfordshire: CBAI Publishing, 2004.

[4]孙良媛,张岳恒. 转型期农业风险的特点与风险管理[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1-10.

[5]张 叶. 论农业生产风险与农业产业化经营[J]. 浙江学刊, 2001(2): 88-91.

[6]王 健,顾培亮. 农业生产风险管理策略的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3(5): 34-38.

[7]陈风波,陈传波,丁世军. 中国南方农户的干旱风险及其处理策略[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6): 61-67.